

## 歼灭战、革命暴力与纳萨尔运动<sup>\*</sup>

王晴锋<sup>\*\*</sup>

【内容提要】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交，纳萨尔派先后在西孟加拉邦的农村与城市地区实施歼灭战和“红色恐怖”，号召革命者武装消灭地主、富农和其他统治阶级。歼灭战以小分队的形式开展暗杀行动，试图以此唤醒民众，引导革命走向全面武装斗争。但歼灭战不仅未能充分动员群众，而且将公开的大众组织及其运动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排斥。歼灭战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纳萨尔派在部分地区建立起红色基层政权，但很快在意识形态、战略和组织等方面产生严重后果，并直接招致政府的严厉镇压，这也是导致纳萨尔派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而言，作为革命策略的纳萨尔暴力是对国家暴力做出的回应。

【关键词】 歼灭战 毛派运动 纳萨尔暴力 印共(马列) 游击战

DOI: 10.16608/j.cnki.nyyj.2017.01.03

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暴力斗争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起着革命的作用，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sup>①</sup>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印度的政治运动就不乏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sup>②</sup>人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冷战世界的民族冲突与治理特点研究”（项目编号：11ZD135）的阶段成果。

\*\*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93 页。

② Manoranjan Mohanty,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7), p. 62.

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sup>①</sup> 在印度历史上,农民阶级具有组织化反抗的传统,莫卧儿帝国晚期曾发生过多起农民起义。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东印度公司通过地方性政权对印度次大陆进行间接统治,导致各种地方性骚乱以及不同规模和烈度的农民暴力抗争,有时候长期的武装冲突堪比内战。20世纪20年代,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蔓延到印度农村地区,但是许多地方仍然继续爆发以改善经济状况为目的的农民运动。农民的抗争并不必然是暴力的,在很多情况下,暴力叛乱和血腥冲突并非农民的首要选择。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会通过请愿与和平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寻求公平正义,而不是直接诉诸暴力或恐怖行动作为政治策略实现其意图。

纳萨尔派(Naxalites)是印度左翼激进主义的表现形式,它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国家政权。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战略思想是纳萨尔派区别于印度其他左翼党派的重要特征,也是它备受争议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纳萨尔运动的极端暴力形式——歼灭战(Khatam)。这种战术以游击小分队的形式作战,对作为个体的阶级敌人实施肉体消灭,是一种不以充分动员群众为基础的革命行动。纳萨尔派采取这种斗争形式是根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由于歼灭战导致了一系列负面的战略后果,纳萨尔派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继而产生党内分化。如今的印共(毛)(CPI-Maoist)与早期的印共(马列)(CPI-ML)一样,仍坚持以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本文试图展现印度纳萨尔运动中暴力问题的复杂性。

## 一、歼灭战的源起与实施

1967年年初,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Naxalbari)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它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民主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sup>②</sup> 它犹如“一声春雷响彻印度”,此后很多农村地区先后出现农民叛乱活动,形成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浪潮。“纳萨尔巴里”这个村落的地名也因此成为印度左翼激进运动“纳萨尔运动”(Naxal Movement)的由来。早期的纳萨尔运动是由革命理论

<sup>①</sup>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Srila Roy, “The Grey Zone: The ‘Ordinary’ Violence of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4 No. 2 2008, p. 317.

家推动的,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和康达帕里·斯瑟拉迈亚(Kondapalli Seetharamaiah)等人支配着纳萨尔主义的话语。从1965年到1967年,纳萨尔派的主要缔造者马宗达先后撰写了八篇重要的政论性论文,鼓励印共(马)(CPI-M)的党员武装反抗印度当局,这些论文为纳萨尔意识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马宗达不仅充分阐释了纳萨尔派的暴力斗争哲学,而且他极力主张的歼灭战更是将暴力实践推向顶峰。马宗达曾亲身参与孟加拉“三一减租运动”(Tebhaga Movement)<sup>①</sup>,他从这些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印度的底层民众已经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以往的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革命领导者的懦弱和背叛。因此,马宗达公开谴责印共(马)领导层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他号召革命者发动武装袭击,处死地主和其他封建统治者,这种革命实践被称作“Khatam”。该词源自阿拉伯语,通常被翻译成英文“annihilation”,具有针对个体的“歼灭、终结和灭绝”之意。歼灭战主要以小分队形式开展行动,暗杀地主、富农、放债者、告密者、警察及其各种代理人等。<sup>②</sup>马宗达将这种小分队行动置于战略的高度,视之为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是摧毁农村封建统治阶级、建立农民政权的重要手段。在当时革命形势的感召下,很多城市中产阶级青年和学生纷纷下乡参加革命。<sup>③</sup>

由于寡不敌众,纳萨尔巴里地区的起义很快被政府镇压,但由此诞生的纳萨尔政治才刚刚开始。当时许多革命者早已无法忍受印共(马)的政治,纳萨尔巴里起义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激进的政治道路。随着党内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印共(马)将马宗达、卡努·桑亚尔、索伦·博思(Souren Bose)等人驱逐出党,其他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和党员则以退党表示声援与抗议。1967年11月,脱离印共(马)的革命者成立了“全印革命者协调委员会”(All-Indi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Revolutionaries, AICCR),1968年5月改名为“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All Indi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AICCCR),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印各地的革命活动。

<sup>①</sup> 该农民运动爆发于1946~1947年间,当时孟加拉的佃农需要将一半的庄稼收成上交给地主,他们不堪重负,强烈要求降低到三分之一。该运动在很多地方演变成暴力冲突,地主纷纷逃离村庄。后来地方政府专门颁布法案(*Bargadari Act*),规定佃农向地主缴纳的租金不得高于收成的三分之一。但该法律并没有完全执行。

<sup>②</sup> Alpa Shah and Judith Pettigrew, “Windows into a Revolution: Ethnographies of Maoism in South Asia,”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 33, No. 3/4, 2009, p. 231.

<sup>③</sup> Srila Roy, “The Grey Zone: The ‘Ordinary’ Violence of Extraordinary Times,” p. 317.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逐渐加强镇压和监控手段,在动乱地区大规模部署警察部队,实施国家恐怖(state terror),具体措施包括军队与警察在革命区域安营扎寨、频繁搜查村庄,对森林地区进行肃清扫荡等,这使纳萨尔派很难保持地理上的优势,也难以继续公开组织大众运动。正是在大众运动收效渐微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势下,纳萨尔派的革命策略发生了转变。1969年4月,“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的党组织决议认为,党应该集中精力发展武装斗争和游击战,而不是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公开的群众集会等形式上。随着新党印共(马列)的应运而生,纳萨尔派继续推行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路线。

印共(马列)完全拒斥选举政治,认为参与选举会妨碍和破坏革命运动,坚持武装斗争和建立地下党组织的策略。马宗达认为,以土地、薪资和工作等为诉求的经济运动难以产生实质性的革命结果,武装斗争是唯一的选择。印共(马列)信奉“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sup>①</sup>它不信任群众阵线,质疑对工会和公民组织的过度关注,甚至贬低公开的、大众的斗争形式,认为这是“经济主义”的表现,而印共(CPI)<sup>②</sup>和印共(马)的修正主义政策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性。马宗达指出,“修正主义思想中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将农民组织(Krishak Sabha)和工会视为唯一的党活动”。<sup>③</sup>马宗达认为,党的主要任务不是组织、领导工会或参与工会选举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压制工人的阶级斗争。农民斗争不是为了获得土地或庄稼,而是为了夺取政治权力。在发动游击战的过程中,群众运动或大众组织并非必不可少。马宗达甚至担心群众组织及其运动会增加党的公开度,不必要地暴露革命力量。因此,公开的群众运动与大众组织成为“发展和壮大游击战的障碍”。<sup>④</sup>在斗争的武器使用方面,马宗达主张采用诸如刀、矛、弓和箭等传统武器,而不是现代化的枪械。<sup>⑤</sup>1970年5月,印共(马列)召开第一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② 这里的“印共”指的是作为政党的印共,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印度共产党。下同。

③ Charu Mazumdar, “Our Task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Marius Dumas ed., *Approaching Naxalbari* (Calcutta: Calcutta Press, 1991), p. 244.

④ J. Mohan, “Naxalites, the New Left,”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5, No. 29/31, 1970, p. 1121.

⑤ Sumanta Banerjee, “‘Annihilation of Class Enemies’: CPI (ML) Tactics at Critical Poi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 No. 35, 1970, p. 1449.

次党代会,其党纲正式宣布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游击战是最基本的斗争形式,它强调歼灭路线的战略思想,将歼灭阶级敌人作为唯一的革命路线,而工会、学生组织和农会等群众组织是次要的、附属性的斗争策略。马宗达认为,“农民革命通过自身的斗争表明,群众运动和大众组织并不是游击战所必需的。”<sup>①</sup>歼灭阶级敌人是任何大众运动的先决条件,大众参与并不是游击战的前提。马宗达相信处死地主等深恶痛绝的阶级敌人将极大地唤醒广大受剥削的民众,从而带动整个革命走向全面武装斗争,并最终建立红色政权。他的革命理论认为,只有成立秘密的地下党才能组织、动员土地革命,只有通过游击战才能进行持久战,贫农和无地农民在游击战中方能确立他们的领导权。在面对组织完善、武力强大和残暴无情的统治阶级发动的军事进攻时,诸如罢工、请愿和示威之类的和平斗争没有实际用处,大众组织无法通过这种公开斗争的方式实现革命。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流血冲突,它必须采取歼灭战这样的强硬手段来对抗国家。在具体执行歼灭路线时,作战小分队通常由5~12人组成,他们运用游击战术秘密地歼灭(暗杀)地主、放债者等阶级敌人。在暴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纳萨尔运动日益变得激进化,马宗达甚至难以容忍任何反对歼灭路线的人继续留在党内。在这一时期,马宗达的《游击队行动语录》(*A Few Words about Guerilla Action*)甚至被奉为“谋杀手册”。当时的纳萨尔运动广为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的双手不曾浸染过阶级敌人的鲜血,那么他就难以称得上是一位共产党员。”<sup>②</sup>

## 二、歼灭战的场域转变:从农村到城市

印共(马列)试图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歼灭战理论也因而很快找到了试验场。随着纳萨尔巴里的革命之火蔓延到斯里卡库拉姆(Srikakulam)地区,<sup>③</sup>印共(马列)掌握了该地区的运动控制权。1969年8月,通过结合隐秘的游击行动和大众参与的歼灭运动,纳萨尔派在斯里卡库拉姆确立了红色政权。当地的地主被打死或出逃之后,地方政权出现权力真空状态,纳萨尔派接管了该区域。随后,革命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持地方秩序,解决民间

<sup>①</sup> Charu Mazumdar, “March Forward by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Peasan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India,” *Liberation*, Vol. 3, No. 2, 1969, p. 10.

<sup>②</sup> Charu Mazumdar, “A Few Words about Guerilla Actions,” *Liberation*, Vol. 3, No. 4, 1970, p. 21.

<sup>③</sup> 斯里卡库拉姆属于安得拉邦,该地区的农民运动与当地部落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

争端,并在贫农与无地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马宗达在秘密造访斯里卡库拉姆之后深受鼓舞,认为它将成为“印度的延安”。当时马宗达乐观地估计,到1971年年初,革命游击队便可以扩展至西孟加拉邦的所有平原地区。然而,随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加紧围攻,红色政权的许多领导人在“遭遇战”中被捕或惨遭杀害。<sup>①</sup>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尽管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西孟加拉邦的黛布拉—戈皮巴拉沃普尔(Debra - Gopiballavpur)和穆萨哈里(Musahari)等地先后爆发武装运动,但都未能持久,尤其是斯里卡库拉姆最终未能遂马宗达所愿成为印度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据地。

纳萨尔派在实行歼灭战后,逐渐放弃了原先的经济斗争和政治运动。歼灭阶级敌人的数量成为判断革命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某个区域是否发生针对阶级敌人的歼灭事件则被视为革命是否已经传播到该区域的重要标志。1970年4月,革命者的运动场域转向城市地区,尤其是将加尔各答及其毗邻的城镇作为城市纳萨尔运动的核心。在转向城市斗争之初,革命活动尚限于袭击资产阶级的教育机构和文化遗产、捣毁国家领导人和历史文化人物的雕塑,并组织学生联合抵制考试等。但是不久,纳萨尔派在城市也开始执行歼灭路线,主要目标是警察、协警、告密者、大资本家以及印共(马)成员等。革命者袭击警察局、释放犯人、暗杀臭名昭著的警察,这些行为受到那些长年遭受警察骚扰之苦的普通民众的称赞。城市纳萨尔运动也给予很多底层的穷苦青年以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上层阶级的富人密切接触,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和革命热情。但是,由于纳萨尔派也袭击学校、医院等非政府机构(这些地方经常成为警察的庇护所),再加上纸媒和电台等公共媒体大肆报道,极力渲染纳萨尔派的血腥暴力,因此,纳萨尔派同样激起了人们的恐惧与厌恶。这一时期,印共(马列)为了灵活组织战斗、招募到更多的参与者,它将游击组织从原先的政治单位中脱离出来,导致革命队伍大量潜入辍学者以及无赖、暴徒等反社会分子。在加尔各答学生运动后期,许多大学生由于不赞成歼灭路线而退出运动,这些反社会分子取代原来的大学生,成为纳萨尔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与受过良好教育、满怀革命理想的大学生不同,这些社会青年缺乏革命意识形态,参与革命的个人动机不纯。他们混在革命队伍里为非作歹,以清算“阶级敌人”的名义公报私仇,杀害宿敌。同时,地方警察也通过安插线人,将势力渗透进革命群体,以从内部瓦解纳萨尔运动。

<sup>①</sup> “遭遇战”应该是武装冲突的双方在偶然遭遇的情况下发生交火,但是在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的冲突中,“遭遇战”成为政府猎杀的借口,很多革命者其实是被蓄意谋杀的。

从1970年3月到1971年3月,纳萨尔派共杀死318人,其中包括警察、地主、商人和放债者等;同一时期,168名纳萨尔分子被杀害。<sup>①</sup>印度政府并非纳萨尔派所宣称的“纸老虎”,<sup>②</sup>警察在镇压行动中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先将可疑人员杀害,然后将他们贴上“纳萨尔分子”的标签。<sup>③</sup>1971年8月,也即全国大选之后,中央政府加快了强制镇压纳萨尔运动的进程,很多纳萨尔分子被杀害或锒铛入狱。仅仅在1971年11月21~28日这一周内,印度政府在西孟加拉邦纠集了近一半的中央警备部队,抓捕了上万名左翼成员。<sup>④</sup>此后,政府力量很快占领解放区。这一时期,加上中国政府在孟加拉危机问题的立场以及对印共(马列)歼灭路线的公开批评,党内有不少人动摇了革命信念。1972年,很多革命者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党,有些人则转而加入了印共(马)和国大党。在1975年至1977年的紧急状态时期,国家压制进一步强化,革命运动的空间被最大程度地压缩,包括印共(马列)在内的27个左翼党派及其外围组织被强制取缔,全国4万余人受指控而被捕入狱。<sup>⑤</sup>随着大量革命者被监禁、严刑拷打甚至在遭遇战中被残忍地杀害,纳萨尔运动损失了许多重要的革命家,党的重要创建者和理论家马宗达也被捕离世,这严重影响了运动的持续发展。第一阶段轰轰烈烈的纳萨尔运动由此告一段落。

### 三、斗争策略的转变与党内分歧

20世纪60年代末,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拉姆、黛布拉—戈皮巴拉沃普尔等地先后爆发武装斗争和歼灭运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促使革命者改变斗争策略,同时也导致内部出现意识形态分裂。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初期,革命者并不排斥群众运动,而是采取大众武装运动的典型形式,包括广泛发动农民参与、建立农民革命委员会,将没收土地与粮食等经济运动及时地转变

---

<sup>①</sup> Sumanta Banerjee, “Maoists: Doing without China?”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6, No. 27, 1971, pp. 1321 - 1322.

<sup>②</sup> Sumanta Banerjee, “‘Annihilation of Class Enemies’: CPI ( ML ) Tactics at Critical Point,” p. 1452.

<sup>③</sup> Arun Sinha, “Kill Them and Call Them Naxalit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10, No. 23, 1975, p. 872.

<sup>④</sup> Devi Azad, “Behind the Liberation of Bengal,” *Pakistan Forum*, Vol. 2, No. 5, 1972, p. 12.

<sup>⑤</sup> Biplab Dasgupta, “Naxalit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in Rural Areas,”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8, No. 4/6, 1973, p. 187.

为政治运动,以捍卫武装斗争的成果。同时,马宗达认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非截然分离或对立,不应该忽略和排斥民众的经济诉求,否则难以动员广大底层的民众参与革命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民众也无法理解纳萨尔派的政治宣传。在当时的纳萨尔派看来,经济斗争是一项长期的革命策略,争夺土地的武装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为了动员民众广泛地参与政治运动,必须进行经济斗争。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sup>①</sup>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1969年年初发动歼灭战后,党的高层否定了经济斗争。纳萨尔派很快意识到,经济条件的改善会削弱穷苦者的政治斗争意识。倘若在未夺取政权之前进行经济斗争,将使农民丧失革命斗志,甚至退出革命运动。因此,必须首先粉碎国家机器才能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否则一切都是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斗争逐渐处于次要地位,只有通过游击战成功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后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斗争。当地主等阶级敌人被消灭、驱逐或归顺,彻底铲除了农村封建权威之后,农民夺取土地与粮食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在纳萨尔派看来,一方面,印度的统治阶级由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构成,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的傀儡政权,统治阶级缺乏人民的拥护,依靠军事压制苟延残喘。另一方面,印度革命的条件臻于成熟,一旦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它便能如野火燎原般燃遍整个印度。也就是说,只要某个地方的民众揭竿而起,其他地方会产生系列连锁反应,革命自然会获得民众的广泛响应,最终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这是纳萨尔派对当时基本形势的判断。因此,党应该顺应时势,而且振臂一呼将应者云集。传统的群众组织和宣传工作极为耗时、耗力又低效,而歼灭战是替代大众组织运动的有效方法,它能将革命运动迅速传播到其他地区。马宗达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革命的条件要优于40年前的中国革命,印度的每个角落都像岩浆汹涌的火山口,斯里卡库拉姆的武装斗争势必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使印度政府不再可能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概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末,纳萨尔运动的策略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否定经济斗争,强调武装斗争;二是忽略大众组织运动,强调歼灭战作为主要斗争形式。长期以来,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采取暴力斗争还是接受“招安”、参政议政一直存在争议,这种分歧是导致印共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

<sup>①</sup>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以 M. N. 罗易( Manabendra Nath Roy) 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家、印共( 马列) 以及后来的印共( 毛) 等极端左翼, 都倾向于以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在历史上, 莫罕达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与实践曾是印度共产党斗争策略的重要对手。1920 年, 当不合作运动可能演变成全面革命时, 甘地和国大党马上下令停止。对此, 罗易曾深恶痛绝地说道“甘地先生用爱和非暴力这种简单的魔法, 就使之( 民族起义) 无能为力并平息下来。……国大党由于否定了自己的追随者的革命行动, 已经实行自杀。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已经在甘地主义的祭坛上作了牺牲。”<sup>①</sup>

革命阵营内部最早对歼灭战进行理论驳斥的是“安得拉邦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 Andhra Pradesh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Committee, APRCC)。纳吉·瑞迪( Nagi Reddy) 领导的安得拉群体从未加入印共( 马列), 他从一开始就反对马宗达的歼灭路线, 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行动策略缺乏大众根基。印共( 马列) 党内的其他一些领导者也对歼灭战持有不同意见。例如, 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 Parimal Dasgupta)、阿西特·森( Asit Sen) 等人将歼灭政策斥为“格瓦拉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 认为它完全与“人民战争”( People's War) 背道而驰。对此, 马宗达做出的回应是, 切·格瓦拉依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武器发动斗争, 而纳萨尔主义依靠的则是底层民众的合作, 不依赖武器装备。<sup>②</sup> 纳吉·瑞迪虽然没有激烈地反对个人谋杀策略, 但他希望将个人谋杀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萨蒂亚纳拉亚纳·辛哈( Satyanarayana Sinha) 也不排斥歼灭政策本身, 但是他反对杀害富农, 而马宗达认为富农与党水火难容。苏什塔尔·拉伊—乔杜里( Sushital Rai - Choudhuri) 反对无差别的杀戮, 而是主张对警察、军队和通敌者以及其他阶级敌人实施选择性暗杀。歼灭政策也引发党内对“战略进攻”路线的反思。纳吉·瑞迪、辛格( S. N. Singh) 和库尼卡·纳拉扬( Kunikal Narayan) 等人认为, 人民战争应从战略防御阶段开始, 而不是战略反攻。慕库缇·郁德哈群体( Mukti Yuddha group) 也斥责马宗达的政治路线是民粹主义与格瓦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的杂合物。此外, 马宗达对游击战持普遍主义的态度, 认为这种战术可以运用于全印各地, 而作为游击战的第一个阶段, 歼灭战也具有这种普遍适用性。纳吉·瑞

<sup>①</sup> [美]琴·奥佛斯特里、马歇尔·温德米勒《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页。

<sup>②</sup> 这里是指马宗达领导下的纳萨尔运动在革命初期采用传统的冷兵器,而不是枪械。但是在随后进行的城市歼灭战中,纳萨尔派很快放弃了这一立场。

迪·辛格和阿希姆·查特吉(Ashim Chatterjee)则强调印度各地的革命条件存在异质性,不适合全面推行歼灭战。

反对歼灭战、拒绝加入印共(马列)的另一个革命群体是“毛派共产党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它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坚持群众路线,拒斥马宗达的歼灭策略,并谴责马宗达是冒险主义者,是切·格瓦拉而不是毛泽东的追随者。但是,后来毛派共产党中心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也逐渐采取歼灭路线。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在成立“人民战争群体”(People's War Group, PWG)、毛派共产党中心转向比哈尔邦之后,纳萨尔派更多的是采取切·格瓦拉式的游击战。

纳萨尔运动被镇压后,传统的左派继续转向“阵地战”,他们更倾向于建立联合阵线、参与执政。印共(马)认同议会政治与和平过渡路线,因此它在很多方面与印共的立场相一致。<sup>①</sup>传统左派虽然认为阶级斗争能够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减少教派冲突和种姓制度的荼毒,但都试图以改良的方式转移民众怨愤、化解社会矛盾。而印共(马列)等激进左派则认为这种修正主义与甘地式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将导致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幻想,并丧失革命斗志。

#### 四、关于歼灭战的评价

在马宗达力倡歼灭战时期,纳萨尔运动成为一种纯粹的军事运动,极大地削弱了政治运动的力量,更是彻底抛弃了经济运动。当时的纳萨尔派为了集中革命力量,主张避免无目的的政治宣传,政治运动必须首先保障歼灭战的顺利实施,一切政治宣传都服务于歼灭行动。而歼灭战采取秘密的组织方式,它仅由少数党员执行。整个游击组织也是密谋筹划的,独立于其他政治单元。游击队员的遴选和招募由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以个体对个体的方式秘密进行,歼灭对象也由他们选取。个人歼灭战与警察在“遭遇战”中消灭革命者的做法并无二致。

在马宗达看来,歼灭战是更高形式的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实施“红色恐

---

<sup>①</sup> 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的政治力量尤为强盛。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它联合其他党派组成联合阵线,两次上台执政。1977年以后,印共(马)更是长期主导西孟加拉邦政坛。See Proshanta Nandi, "Communism through the Ballot Box: Over a Quarter Century of Uninterrupted Rule in West Bengal," *Sociological Bulletin*, Vol. 54, No. 2, 2005, pp. 171 - 194.

怖”能够威慑懦弱的统治阶级。从短期来看，歼灭战确实取得了成效，它歼灭少数暴虐的压迫者，迫使担惊受怕的地主逃亡到城里避难，而留下来的传统统治阶层则屈从于革命者。通过这种方式，纳萨尔派掌控基层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宣告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因为即使在以前缺乏大众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地方，也能通过歼灭战获得控制权。然而，除非党能够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军队、开辟解放区，并为农民提供安全保障，否则这种红色恐怖很难长久地维系和推动革命运动。<sup>①</sup> 歼灭路线在意识形态、战术和组织等方面对印共（马列）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且它是以阻碍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纳萨尔派实际控制的区域通常是最偏僻和贫穷的山林地区，他们反对政府进行的修路、筑桥、建坝等发展措施，认为这些活动将有利于国家安全部队侵入纳萨尔派占领区。纳萨尔派与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还极大地缩减了民主活动的空间，面对社会秩序的失范，受纳萨尔派干扰的地方政府势必加强镇压并扩大压制范围，使很多非暴力抗争被认为是纳萨尔派的阴谋而遭到取缔和压迫。<sup>②</sup> 歼灭战先后在印度的农村与城市地区宣告破产，它并未撼动整个印度的基层政治系统，反而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安得拉邦，缺乏群众基础的歼灭战使革命失去了当地部落的同情和参与热情。在没有大众组织和民众强有力的支持的情况下，纳萨尔派极易成为国家安全部队的袭击目标。当血腥谋杀成为衡量党员的革命品质和红色恐怖的必要条件时，其后果是大量投机分子、无业游民和恶棍流氓混入革命队伍。<sup>③</sup> 这些人没有被灌输或并不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缺乏强烈的革命动机，对革命持怀疑、观望和不确定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很多流氓无产者混入纳萨尔运动，导致加尔各答的革命形势变得无序化，很多反社会分子肆意实施政治谋杀，党的高层无法及时杜绝他们胡作非为。<sup>④</sup> 有些反社会分子拉帮结伙、私结朋党，或带着武器逃之夭夭，甚至转而对抗纳萨尔运动。<sup>⑤</sup> 因此，印共（马列）在加尔各答实施的以游击小分队行动和个人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都市歼灭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革命者未能歼灭重要

① Sumanta Banerjee, “‘Annihilation of Class Enemies’: CPI(ML) Tactics at Critical Point,” p. 1449.

② Bela Bhatia, “On Armed Resista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29 2006 p. 3181.

③ Biplab Dasgupta, “Naxalit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in Rural Areas,” p. 185.

④ Rabindra Ray, *The Naxalites and Their Ideolog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58.

⑤ Bela Bhatia, “On Armed Resistance,” pp. 3179 – 3183.

的阶级敌人。恰恰相反,加尔各答的高层统治者和官僚阶层是社会失范状态下唯一有安全保障的人。

印共(马列)坚持以游击战夺取国家政权,将歼灭战视为革命斗争的唯一战术,而忽略大众组织运动;同时,它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纲领。歼灭战后来被斥为“低级恐怖主义”,这种个人恐怖不仅没有增强工人与农民的阶级意识,而且也缺乏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组织化。歼灭战甚至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梦想,它试图以一小撮武装分子施行的个人恐怖推动民众运动走向高潮。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切·格瓦拉曾认为,革命的条件可以通过革命者自身的能动性创造出来,因此没有必要等待革命时机成熟。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马宗达的歼灭战策略更多的是拉美式革命理想,它强调的不是政治路线、大众动员和统一战线,而是以游击队作为革命精英与先锋队,以极端暴力作为获取革命成功的捷径。在执行歼灭战时期,纳萨尔派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民众对建立解放区并没有充分的信心。歼灭战针对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村落掌权者、放债者等,但其中很多对象与纳萨尔派的参与者一样,也同样出身于卑微的家庭,被杀害的大地主和放债者其实不到总数的1/3。<sup>①</sup>总之,歼灭战不仅没有促进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反而葬送了它的远大前程。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革命有利条件之一是半殖民中国地方农业经济(不是同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导致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sup>②</sup>他明确指出,实施歼灭战需要满足“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不可缺少的条件。<sup>③</sup>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条件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sup>④</sup>马宗达等印共(马列)的领导层高估了印度革命的主观条件,包括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实力的误判。事实上,当时的革命者极度缺乏枪支弹药,很多游击队员没有经过充分的军事训练而仓促上阵,也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即使在斯里卡库拉姆地区,当纳萨尔派得到部落的充分支持与合作时,革命运动也没有扩展到周围的平原地区,它并没有对部落之外的地区造成深远的影响。同

<sup>①</sup> Biplab Dasgupta, "Naxalit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in Rural Areas," p. 177.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sup>③</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

<sup>④</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时,革命者又低估了印度政府的“白色恐怖”和军事镇压能力,以为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当国家安全部队进入解放区时,只遭遇到微弱的抵抗。1972年7月,随着马宗达等领导人的被捕和牺牲,党内的严重分裂已无法再弥合,纳萨尔运动陷入低潮。

## 五、极端暴力与反暴力

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沉寂之后,纳萨尔运动卷土重来,尤其是2004年成立印共(毛)之后,它日益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关注。印度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MHA)2004~2005年的年度报告指出,全印91%的暴力和89%的暴力致死都是由纳萨尔派引起的。<sup>①</sup>2006年10月,印度内政部专门设立“左翼激进主义分部”(Left-wing Extremism Division),负责处理受纳萨尔主义影响区域的安全问题。在极端左翼的军事力量中,印共(毛)居于支配性地位,绝大多数纳萨尔暴力与印共(毛)有关。近些年来,纳萨尔派继续采取谋杀性袭击,其对象甚至包括印共、印共(马)等传统左派,因为他们在印度主流政治系统中取得的成功是对左翼激进主义的重大阻碍。从2010年到2015年,有2162名平民(大多是部落民)和802名安全部队人员在全印不同地区的纳萨尔派袭击中丧生。<sup>②</sup>在很多人看来,政治异见和社会动乱无法通过暴力杀戮来解决,近乎失范的暴力与政治骚乱对卷入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无益。歼灭路线和暴力也一直遭到很多党外人士的批评。例如,2013年6月15日,印度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经济政治周刊》(*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刊登了署名为迪恩达亚尔·卢拉(Deendayal Lulla)的读者来信,呼吁印度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剿灭纳萨尔派,这种立场以及反对的原因在当今的印度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中讲道“毛派(即纳萨尔派)攻击桥梁、火车站、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这与他们为穷人而战的主张背道而驰,因为这些设施是给被压迫者使用的。毛派只不过是些黑社会团伙而已,他们大肆敲诈勒索、强迫征募。他们的暴力手段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在其控制区域的不发展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政府应采用武装无人机等

<sup>①</sup>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2004 - 2005,” p. 39. [http://mha.nic.in/sites/upload\\_files/mha/files/pdf/ar0405-Eng.pdf](http://mha.nic.in/sites/upload_files/mha/files/pdf/ar0405-Eng.pdf)

<sup>②</sup> 参见印度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http://mha.nic.in/naxal\\_new](http://mha.nic.in/naxal_new)

空中力量打击这些残忍的恐怖分子。”<sup>①</sup>

人们反对纳萨尔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采取极端暴力。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早就对革命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做出过论述。1924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在《先锋报》(*Vanguard*)上发表《对民族主义者的呼吁》(*Appeal to the Nationalists*)一文,阐明暴力本身并非革命的本质特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成功不可能不流血和没有暴力,但是并非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流血牺牲都是革命。对作为个体的资本家和地主等实施暗杀并不能根除不平等现象、推翻社会剥削制度或政治机构。1951年,印共发布的《政策声明》亦表明个人恐怖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没有发动大众参与革命,却反而滋生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人英雄主义能够取代大众斗争。如果过于倚重恐怖袭击作为政治工具,它将混淆革命运动与恐怖主义。早在纳萨尔运动初期,也有人质疑“歼灭阶级敌人”这样的革命标语。总之,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反对极端暴力,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要支持暴力本身,暴力仅是权宜之计。在今天,很多人担心纳萨尔派的游击战(尤其是马宗达式的歼灭战)会退变成“恐怖主义”<sup>②</sup>或组织化的犯罪活动。<sup>③</sup>

在纳萨尔暴力的批评者看来,从农民在游击队的协助下消灭阶级敌人,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与群众运动无任何关联的对地主实施恐怖袭击,游击战被简化、甚至等同于“个人灭绝政策”。它将消灭阶级敌人的肉体视为游击战的本质特征,将人民战争简化为小分队的歼灭战,并进而退变成个人恐怖主义。他们批评纳萨尔派在革命意识形态伪装下的反社会本质,践踏法律与无辜民众的生命,甚至利用暴力手段谋取私利,使暴力成为获取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策略。因此,这些批评者认为,纳萨尔运动已不是一场寻求社会正义的反叛运动,而是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的严重威胁。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来看,以个体暗杀为主要内容的歼灭路线并非有效的组织方式,它无法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并且破坏了革命先锋队与大众运动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哲学中,阶级斗争“是广大无权者、被压迫者和劳动

<sup>①</sup> Deendayal Lulla, “Maoist Violence - II,”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8, No. 24, 2013, p. 4.

<sup>②</sup> Ajay Mehra, “Naxalism in India: Revolution or Terror?”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2, No. 2, 2000, p. 37.

<sup>③</sup> Prem Mahadevan, “The Maoist Insurgency in India: Between Crime and Revolution,”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3, No. 2, 2012, p. 203.

者反对特权者、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sup>①</sup> 而纳萨尔派的个人恐怖主义使革命政治降格为狭隘的个人复仇行为,导致暴力的恶性循环和“善”“恶”之间的永恒杀戮。革命者以恐怖袭击作为创造新的社会秩序的方式反而滋生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政治,造成公民社会的永久性撕裂。<sup>②</sup>

人们批评纳萨尔派已经沦为暴力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几乎将暴力当成目的本身或以暴力取代政治,忽视暴力的伦理问题。<sup>③</sup> 批评者指责纳萨尔派是一群没有信仰的暴徒,尽管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农民意识到国家压制性权力的真实面目,但它最终导致运动抛弃了群众基础,并且无力、也无意消除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的绝对贫困现象,而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和针对个人的秘密暴力。<sup>④</sup> 马宗达过于迷恋暴力、鲜血和殉难牺牲,暴力的机器一旦开启,便很难终止。在暴力的恶性循环中,纳萨尔派自身也成为受害者,不仅导致大量的领袖牺牲,而且沾染了暴力的污名。作为纳萨尔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卡努·桑亚尔在晚年厌倦了极端的左翼激进主义,他并不反对武装斗争本身,但是厌恶暗杀与个人恐怖主义。2010年,桑亚尔自杀身亡。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指出印共(毛)过度依赖暴力,有悖于纳萨尔运动的革命初衷。<sup>⑤</sup> 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桑亚尔谴责印共(毛)“利用原住民充当傀儡,以推动他们的个人恐怖主义计划”。<sup>⑥</sup> 在此类集体性的暴力行动中,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都难以摆脱暴力恶性循环的伦理与责任。

## 结 语

本文探讨了纳萨尔运动的歼灭战策略与极端暴力现象,由于暴力问题始终与纳萨尔运动纠缠不清,纳萨尔派也因此而不断地遭到印度政府的严厉镇

---

① 列宁《告贫苦农民》(1903年3月1日和28日[3月14日和4月10日]之间),《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② Bela Bhatia, “On Armed Resistance,” p. 3179.

③ Bela Bhatia, “On Armed Resistance,” p. 3180.

④ Richard Bownas, “The Nepalese Maoist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y of Naxalism in India,” *Himalaya*, Vol. 23, No. 1, 2003, Article 8.

⑤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桑亚尔和马宗达之间在武器使用问题上已出现过分歧。See Sumanta Banerjee, “‘Annihilation of Class Enemies’: CPI(ML) Tactics at Critical Point,” p. 1452.

⑥ Bibhu Routray, “Naxal Violence in 2015,” Institute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 Special Report No. 173, 2015, p. 7. [http://www.ipcs.org/pdf\\_file/issue/SR173-Forecasts-LWE-Bibhu.pdf](http://www.ipcs.org/pdf_file/issue/SR173-Forecasts-LWE-Bibhu.pdf)

压以及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同时,它也涉及民主国家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宏大议题。大众武装运动与歼灭战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大众武装运动反对谋杀,强调大众参与,并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这种斗争策略使革命在小范围内出现了红色政权,诸如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地区。但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印共(马列)在农村实施歼灭战,在城市(主要是加尔各答)采取红色恐怖,尽管这些活动在局部地区取得一定成效,但它轻视大众动员、忽略底层的经济诉求,还导致犯罪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造成底层社会的撕裂和相互仇恨,最终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纳萨尔运动不仅仅为了实现某些经济目标,诸如减租、增加收入、减免债务以及土地分配等,它旨在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由于运动参与者经济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其革命意识,因此纳萨尔运动内部一直存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也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抵触的问题。这也是为何近年来印度政府在处理纳萨尔问题上发生策略性转变的原因,即从纯粹的军事镇压转变成经济发展与军事打压并举,不再认为纳萨尔运动是纯粹的法律与秩序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发展问题。印度社会的结构性贫困、政治裙带关系、种姓仇恨、社会经济不平等、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无法获得国家权力和资源等都是导致纳萨尔运动的具体原因,其中极端不平等和被边缘化等结构性条件在导致暴力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安得拉邦、比哈尔邦的农村地区以及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的部落聚集区,封建统治阶级和政府官僚实施各种形式的暴政,诸如由政府任命的护林官阻止部落进入他们传统的领地等。在安得拉邦,警察以搜捕纳萨尔派的名义突袭村落、强奸妇女;在比哈尔邦,高种姓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私人军队打压低种姓和部落;诸如此类。正是由于印度底层长期遭受各种剥削与压榨,促使他们在纳萨尔派的领导下进行集体暴力抵抗。纳萨尔派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挑战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就此而言,纳萨尔暴力是对国家暴力做出的回应。<sup>①</sup>作为革命策略的暴力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而非纯粹的暴力犯罪。

(编辑 毛悦)

<sup>①</sup> Sumanta Banerjee, "Naxalites: Time for Introspection,"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38, No. 44, 2003, pp. 4635 - 4636.



this regard. Incorporat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BRICS performance with respect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BRICS are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which tend towards a very passive posture with respect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o the contrary ,BRICS countries have overcome obstacles related to particip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have effectively utilized these mechanisms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respect to trade. While they mainly participate as third parties ,in most WTO trade disputes where BRICS states have interacted with one another ,they have maintained common positions. This article also considers the involv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BRICS countries and the likely direction that coordination of their activities is to take in the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is cooperation can have a critical effect when it comes to resolving trade disputes and helping to clarify WTO rules.

KEY WORDS: BRICS countries; Trade Disputes; Multilateral Trade Governanc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 **Khatam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nd the Naxalite Movement**

By Wang Qingfeng

ABSTRACT: Betwee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Naxalites advanced Khatam ,or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strategy and a “red terror”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parts of India – West Bengal. These movements called upon revolutionary militias to eliminate landlords ,wealthy farm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Khatam involved small teams which undertook assassination efforts with the broader objective of arousing mass opposition towards full scale armed revolution. However ,Khatam failed to achieve full scale mobilization and instead caused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related movements to reject the effort as revisionism. While the Khatam strategy did see limited success in establishing Naxalite – controlle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a number of localities ,it quickly ran into serious ideological ,strategic and organizational difficulties ,causing a forceful government crackdown against the movement. This is a key reason for the internal divisions

that emerged within the Naxalite Party. On the whole ,the violent Naxal movement was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which attempted to respond to state violence.

KEY WORDS: Khatam; Maoist Movement; Naxal Violence; CPI ( ML ); Guerrilla Warfare

###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Afghan Polit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Influence**

By Yan Wei

ABSTRACT: Political Isla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contemporary Afghanistan. During mid – 20th Century ,urban Afghani religious figures created the precursor of Political Islam “Ustaz”. While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is organization was to oppose secular reforms and leftist political dissidents ,follow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Afghan quagmire ,it developed into the backbone of the anti – Soviet movement. After the Soviet Army withdrew from Afghanistan ,the movement degenerated into specific ethnic or local fiefdoms ruled by warlords. In the early 1990s ,following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Afghan political Islam underwent major changes with respect to social structur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ties ,and ideology. Fundamentally ,Afghan political Islam is a socio –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under the veneer of religion ,mobilizes individual nationalities or clans. At present ,the re – emergenc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he form of the rise of the “Neo – Taliban” represent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in Afghanistan.

KEY WORDS: Afghan 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Islam; Taliban; Jamiat – e – Islami

### **Considering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By Zhang Jijun

ABSTRACT: The “Islamic State” is a political Islamic organization which rose in Iraq and Syria in 2014 ,and which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its influence through a strategy of aggressive territorial conquest.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he world’ s most influential extremist organization. Since the time of its establishment